

澳大利亚 当代小说研究

叶胜年 著

Contemporary Fiction of Australia
Survey and Study



东南大学出版社

澳大利亚当代小说研究

叶胜年

东南大学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12 号

责任编辑 巫之鹤

封面设计 顾晓阳

澳大利亚当代小说研究

叶胜年

*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18)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新中彩色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625 字数 185.2 千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1023—913—9/G·86

定价:12.00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这本小册子里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在国内各种报刊上发表过的,或根据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扩充修改的;其二是专门为这本小册子撰写的。不管这些文章属于哪一类,它们都是这段时间接触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一些心得体会。能够结集出版,既是对以往成果的一次检阅和小结,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同时借此机会求教于国内有关专家和同行,希望对我国读者了解当代澳大利亚小说有所裨益。

我对澳大利亚文学的兴趣开始于十余年前的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其时在该院的澳大利亚文学课

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亨利·劳森,帕特里克·怀特以及其他一些澳大利亚作家的名字,读到了他们的作品,我从中领悟到了澳洲风光人情的魅力。但是真正让我下决心在澳大利亚文学领域做些事情,探讨其中奥妙的还是我的朋友斯蒂芬·默里—斯密思(Stephen Murray—smith)。当时他担任澳大利亚一家文学杂志的主编,要我写些文章。作为报酬,他给我寄了些澳大利亚文学书籍。正是这批书为我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初步的条件。斯蒂芬为人慷慨好客,乐于助人,曾经给我不少鼓励和帮助,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可惜他因劳累过多,不幸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否则我想他会很高兴地看到这本书的问世。在这里,我向他表示深切的怀念,并且向他的夫人尼塔和他的孩子们致以慰问。

当然我要感谢的朋友还不止斯蒂芬一个人,他们还包括我以前的老师爱德华·鲁希(E·Rush),赖·米森(Ray Mission),戴维·麦克莱(David Mcrae)和彼得·哈罗威(Peter Halloway)。他们或者用他们的学识向我打开了澳大利亚的文学之门,或者解答了我在这方面的疑难困惑,或者向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资料,或者为我送来了勉励之词。

澳大利亚当代小说是个十分广阔的领域,不仅流派纷呈,数量浩繁,而且因为是当代,处于发展之中,难以定论。仅凭十来篇文章或者一本小册子就来研究这样一个大而深的题目无疑是自不量力。我想我的任务只是导游,在美丽如画的偌大风景区前面,告诉游客们大约的线路和范围,介绍一些主要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然后领着参观几个代表性的风景点。至于详尽领略其中的风光,就要看游客自己了。

全书共分十四章,各章之间既有联系,又各各自成篇。结

构上比较松散些,不求完整系统,只求前后连贯,相互照应。从内容上看,基本分成两类。一类是从宏观上分门别类介绍,一类是从微观上对几个代表性作家做些具体的研读。也有个别例外,如对中澳当代小说比较研究的那篇当属于另一类范畴,因为和当代澳大利亚小说有关也就放到一起了。此外在挑选代表性作家时虽然考虑到了不同的领域,但显然是偏重那些具有创新意识,在写作手法上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因为面广量大,见仁见智者在所难免。尽管从主观上想尽可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和研究,为我国读者了解当代澳大利亚小说提供点方便,但由于自己水平的局限,加之其它条件的不足,能否实现初衷还将拭目以待。

这本书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江苏省教委教学处以及镇江师范专科学校的关心和帮助,在此我表示由衷的谢意。东南大学出版社在明知经济效益不会很好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书,实在难能可贵。此外我的家人为我这本书也做出了很多牺牲,我母亲为我承担了许多家务劳动,我妹妹和我爱人替我誊写书稿,在此也一并感谢。

叶胜年

1994年2月23日于上海

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前言	
导论	(1)
成功的试验:澳大利亚新小说	(28)
崛起和发展:澳大利亚土著人小说	(54)
对男人地位的挑战:澳大利亚妇女小说	(69)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中的创作手法刍议	(95)
澳大利亚文化和小说:盘根错节的关系	(107)
中澳当代小说比较:感觉—幻觉模式	(135)
孤独而荒凉的精神世界	
帕·怀特小说的主题意蕴	(152)
对历史的思考:托·肯尼利小说初探	(164)
彼得·凯里:美丽的谎言编造者	(181)
批判和创新:戴维·爱尔兰的新小说	(204)
伊·乔利:真实和虚幻	(221)
默里·贝尔:神奇的照相师	(238)
近年澳大利亚小说述评	(251)
参考书目	(262)

导 论

虽然澳大利亚立国时间不长，但澳大利亚文学从殖民时期起，也就是正式建立联邦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已经初见端倪。当然那时的所谓文学也只是些初来乍到的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对这片神奇土地的感情寄托，驱除寂寞的一种消遣方式和生活记录而已，多少带有些殖民者创业的坎坷和对生存艰辛的感叹，文学性不算很强，也难以和当时英国的一些正宗文学相提并论。这种情况持续到上个世纪末，才开始有了些重要变化。首先是亨利·劳森为代表的短篇小说的出现，这些小说一扫先前充斥在澳洲中上层社会的殖民文学和宗主国文学的影响，确立了丛林中的伙伴关系在澳洲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为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积极



贡献。

从本世纪 20 年代开始,一批重要的作家和他们的小说不断地问世。虽然这些小说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旅居海外的澳大利亚人写的,但是它们从各个方面表现了当时澳大利亚社会的人际关系和内心冲突,代表了较为广泛的社会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小说吸收英国和欧洲小说的创作技巧,从整体水平上已经接近英国和欧洲的小说。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当局在那段时间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政治经济事务上面,以求得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在文化上基本满足于从英国和欧洲引进的东西。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有没有自己的文学作品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虽然少数有识之士为建立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大声疾呼,努力奋斗,但终究势单力薄,难成气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文学默默无闻,从整体上说没有引起世人的注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本世纪 40 年代,直至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二次大战以后澳大利亚文学,包括小说在内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到 60 年代末,第二个阶段则从 70 年代初到现在。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社会现实主义小说占主导地位,第二个阶段则是以心理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试验派小说逐渐占了上风。

社会现实主义小说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劳森乡村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和 30 年代的左翼图书俱乐部的出现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图书俱乐部在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团结了一批立志于社会改革的作家,主张小说要反映澳大利亚的现实生活和斗争的传统。进入 50 年代,执政的澳大利亚政府日趋保守,在国际上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社会主

义阵营相对抗，在国内则竭力抑制任何带有革命标志的激进思想。以表现现实，批判社会为宗旨的左翼作家这时成立了澳大利亚图书协会与之对抗，专门出版和发行这方面的小说。

在和政府图书检查制度的对抗过程中，一批有思想价值的小说得到了出版。这些小说包括弗朗克·哈代的《不光荣的权力》、《克林卡拍拉的男人和其它获奖小说》，拉尔夫·德布瓦士尔的《王冠上的宝石》，朱达·沃顿的《外来的儿子》，约翰·莫里森的《二十三》，M·巴纳德·埃尔德肖的《明天和明天》，埃琳娜·达克的《小伙伴》。这些作家的共同点是他们的社会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源于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法西斯的兴起和二次大战。他们普遍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不幸归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埃尔德肖在《明天和明天》里就这样写道：

整个世界都有毛病。战争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可怕动乱的表现，是从内部爆发的。裂缝在社会里扩大，竞争在加剧升级，生存在竞争，爱在竞争，痛苦和死亡也在竞争。^[1]

对于许多进步作家来说，他们有责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种混乱和腐败，也有责任展示一种新的思想和秩序。在他们的作品里，民主和法西斯，野蛮和文明，残酷和理性都暂不两立，相互对抗。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无疑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它们显然还有别于任何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文艺作品。

他们的写作宗旨和写作方式最早在朱达·沃顿主编的

《冲突》里得到了反映：“新文学就是事实，……和病态的情节、三角性关系以及过去的个人英雄主义相决裂。他要用事实去创作。”^[2]这种观念当然有些极端，但却为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规定了基本原则，这就是主张小说客观地记录和反映社会现实。阿伦·马歇尔在他 40 年代后期的长篇小说《你的脚是多么漂亮》里充分表现了这条原则。

这部小说以一座制鞋厂为中心，安排了许多人物。但是这些人不再由作者主观想象编造出来，而是由作者根据需要显现了各种社会力量和思想类型。作者在进行构思时并不是仅仅考虑要完全符合社会现实，而是容纳了许多被过去传统所摒弃的事实。小说用一个女人坠胎的故事作为叙事框架表现了当代人社会关系的危机，其内容涵盖超越了自由思想的范围，包孕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冲突、社会价值的反思乃至优生学的范畴。实际上社会现实主义手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情节的编排或者对事实的记录，而是经过延伸成为表现社会历史现实的一个宽泛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澳大利亚的社会现实主义经过许多作家的努力和开拓，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开放的写作手法和小说流派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现实主义流派的政治色彩逐渐淡薄。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的影响在缩小，30 年代到 50 年代比较活跃的一些左翼作家，例如，普里查德和莫里森等人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另外一方面，社会的发展，现代派等试验派技巧的不断涌现，也为人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多种角度和方法，为社会现实主义手法内涵的拓宽创造了条件。

在澳大利亚的小说创作里，和社会现实主义手法相对应的是现代派手法。虽然现代派作品的出现要迟于社会现实主

义作品,但从一开始它就因为显现了与以往传统表现手法不同的特点而引人注目。

最早在小说创作中引进现代派手法的是切斯特·考伯。他的两部 20 年代在伦敦出版的小说《莫法特先生》和《幻灭的日子》首次运用了意识流技巧描绘了悉尼郊区生活。考伯的小说虽然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迟出了三年,但在有些地方还是很相象的。它们都描写了都市的乏味生活,都运用了大量细节刻划了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表现了城市人对这种生活所做的反应,特别是在意识领域,包括社会中下层人士所呈现的各种心态。但比较起来,考伯小说缺少乔伊斯小说的思想深度,没有支撑《尤利西斯》的那种取自《奥德赛》的象征性框架,过于突出了细节的真实,而忽略了对形而上层次乃至神秘氛围的渲染。

在这以后出版的几部带有现代派色彩的小说包括克里斯蒂娜·斯泰德的《悉尼的七个穷人》,亨利·亨德尔·理查逊的《理查·马奥尼的财富》第三卷。后者共三部,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小说着重探讨了人在感情上的疏离,这种疏离主要从两个层面来表现。一个是肉体上的,主要人物马奥尼长期患有一种慢性疾病(可能是梅毒),注定要命运不佳,不得善终。一个是精神上的,马奥尼的狂躁不安乃至失常源于他对物质至上社会的不满。最后一卷里作者运用梦境、幻觉和失神等心理表现手法来凸现马奥尼内心的痛苦,不正常的心态,使小说增添了多层次的蕴涵。

以上的几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开创了澳大利亚现代派小说的先河,为澳大利亚现代派小说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惜的是这三个人都是长期旅居在国外的澳大利亚人,从某种

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还不可能对澳大利亚国内文学界产生多大影响。就在现代派艺术和文学从英国和欧洲向世界各地蔓延的时候，澳大利亚国内的一些人开始向现代派发动了攻击。这些人认为现代派没有表现现实生活，或者即使表现了，其重点也只是生活的阴暗面，现代派作家诸如美国的卡明斯，斯泰恩和英国的乔伊斯的写作风格支离零乱，缺乏连贯性，对语言的使用不规范，甚至破坏了语言的基础。他们有的人甚至还认为现代派的东西是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的侮辱。就连象 P. R. 斯蒂芬森这位曾经在二三十年代和英国现代派作家有过密切联系的著名评论家，后来也把现代派称之为颓废的犹太神秘主义。

尽管如此，现代派作为一种新的表现手法还是很快在澳大利亚文坛掀起了一股热浪。到了 40 年代象 A. D. 霍普和约翰·安徒生这样原先对浪漫派都不太信任的人，在他们的作品里对心理分析乃至超现实主义都产生了兴趣。然而真正让现代派在澳大利亚广为人知的还是文学杂志《愤怒的企鹅》。这本杂志的主编麦克斯·哈里斯团结了一批作家和艺术家，积极推行现代派的写作风格和技巧，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推出了超现实主义小说《植物眼》。虽然《愤怒的企鹅》一派并没有发表多少重要作品，他们的活动无疑推动了现代派最终在澳大利亚的安营扎寨。

然而从整体上说澳大利亚文坛对现代派一直抱有怀疑态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占有明显的统治地位。帕·怀特在 50 年代的一篇文章里曾不无抱怨地提到二次大战结束时他所看到的澳大利亚文坛充斥着“单调乏味，毫无生气的现实主义作品”。^[3]虽然在四十年代一些带有现代

派特色的小说，例如克里斯蒂娜·斯泰德的《爱孩子的男人》、《仅仅为了爱》，乃至马乔里·巴纳德的《柿树集》曾经吹起过一阵清风，但澳大利亚传统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潮根深蒂固，绝非一两个作家和几部作品能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怀特的回归和一系列现代派作品的问世对最终在澳大利亚建立起现代派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作为现代派文学大师，怀特的创作从两个方面震动了澳大利亚文坛，最终使澳大利亚文学走向世界。一个方面是他的作品始终抓住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特别是普通人内心矛盾的冲突和演变的趋势，以及自我的永不满足和不断追求，表现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宗教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对立和互相依赖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他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上进行了许多试验和创新，形成了一套包括隐喻、讽刺、诙谐、喜剧等特点的表达方式。他还在创作中引进了大量的口语，借鉴了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艺术形式，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独树一帜，把从英国和欧洲带回来的现代派思想和创作手段同澳大利亚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冲破了重重阻力，逐渐建立了他独特的以心理现实主义为特征的创作手法和风格。他的《人生》、《沃斯》、《乘马车的人》、《完整的曼茶陀》、《解剖者》、《风暴眼》、《遮羞的树叶》和《特博思的爱情》等十余部小说最终奠定了他作为澳大利亚文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地位，也宣告了带有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特征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流派在澳大利亚文坛上日益上升的趋势。

随着怀特作品的不断问世，从 50 年代开始，一批新的着重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小说不断向澳大利亚读者展现了它们的独特魅力。伊莉莎白·哈罗尔从五十年代末起一连推出了

四部心理小说,其中写得较好的一部是《前景》。这是一部以一个女孩成长为中心内容的故事,集中绘述了埃米莉如何摒弃母亲和外婆的价值观念,选择了一条她认为有意义的生活道路。

另外一个以心理描写见长的小说家是伦道尔夫·斯托。他的获奖小说《到海岛去》和《土莫林》的中心议题都是孤独,一部描写了传统教士与世隔绝的生活,追求神话岛屿的幻影;一部刻画了和人类社会没有往来的小镇和几个心怀各异的怪人。

除此以外,一批较年轻的作家从60年代开始也逐渐地显露出他们的才华。他们的作品取材广泛,主题结构千差万别,风格迥异,手法多样。这些作家普遍熔现实主义创作技巧和现代派试验手法于一身,集各种流派之大成,虽然在个人爱好和风格上有所差别,试验性成分多少也不一样,但以前那种从创作思想到具体创作手段都截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作家已经是不多了。随着这种趋势的日渐形成,加之从60年代末起,官方对书刊出版检查制度的废止,以及许多文学奖(主要是小说诗歌)的设立,澳大利亚小说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这些小说大致可分为历史小说,移民小说,战争小说,土著人小说,妇女小说和新小说。下面准备分门别类地逐一进行些粗略的介绍。

首先是移民小说。这类小说的共同点是融合了两种或更多的文化,通过几种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作者往往能够提供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观念,让读者感受到不同的文化价值和生存的艰难。这类小说的作者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是旅居国外或在海外旅行、工作的人;另一种是从国外移居澳大利亚的

人。前一种很多都采用了纪实手法。或是捕捉到了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作为小说的框架。

C. J. 科克的小说《海墙那边》选择了一个敏感而又颇带感情色彩的主题：澳大利亚和它昔日的宗主国英国的关系。对于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英国既是一个母亲国，又是个逐渐远去的国家。它们之间有着相同的文化纽带，同时又有不同的文化特点，更重要的它们是两个国家。小说通过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的描写，探讨了英澳两国复杂而又困难的双边关系。“没有一个英国男人或女人能够具有英国血统的殖民地澳大利亚人或新西兰人对英国的感情经历……，我们不是任何国家的臣民。”^[4]

科克的另一部小说《危险的年代》用纪实的手法描述了1965年印度尼西亚风云突变的政治舞台。采用当事人实录或者记者采访的手法，比较客观的回忆或观察澳大利亚不远的邻国或亚洲国家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特色。这些小说的作者相当一部分是长住国外的，他们包括彼得·波特，巴里·汉姆弗里斯，克里弗·詹姆士，吉迈恩·格里欧，伦道尔夫·斯托，格莱达·亚当斯，塞姆纳·洛克·艾略特，雪莉·哈泽德，罗伯特·休斯和珍妮特·霍斯皮特尔。虽然他们旅居国外，却时刻没有忘却对故国的思念，这份眷念和情愫不时撒落在他们的小说里。雪莉·哈泽德的《飘落的维纳斯》勾勒了澳大利亚姑娘在国外的爱情经历，虽然一波几折，值得庆幸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带有喜剧色彩。另一部带有喜剧味道的小说是约翰·奥格拉迪的《他们是群怪人》。叙述者仿照一个意大利移民的口吻，从记者的角度观察澳大利亚社会的芸芸众生，妙趣横生，千奇百怪，又不乏教育意义，出版后受到

广泛赞誉，后被拍成电影。

澳大利亚移民众多，带来了各自的文化特点。移民出身的作家往往从他们独特的文化背景出发，透视澳大利亚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带有他们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直接生活感受，又掺杂了他们原有文化的强烈对照。从 60 年代以来这批作家的队伍日益壮大，而且其作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在不断增加。

朱达·沃顿的《远方的国家》描写了俄裔犹太移民在墨尔本的生活。安蒂高恩·克法拉的《岛》探讨了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心态，那种既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又不能分享移居国富裕生活的尴尬境地。科克的《两面人》通过移民对往事和故国的回忆加深了他们的失落和惆怅。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 70 年代以后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官方对文化多元化的提倡，移民小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主题倾向来说，移民小说不再仅仅限于对移民生活艰辛的哀叹和对故国文化的留恋，而将描写的座标定在对新生活的期待和展望，对融合到多元文化社会的喜悦和信心上面。从写作技巧来说，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不再是从事移民小说创作的作家的唯一选择。他们中的不少人吸纳了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写作技巧，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移民生活题材，用不同方式传达了移民的声音，刻画了他们的形象。

玛丽娅·刘威特的自传体小说《无雪的十二月》讲述了一个波兰移民家庭的故事。移居到一个国家，学习语言是首要问题。在这方面孩子们有着特殊的天赋，这家的父亲不得不向孩子学习正音。但在这种尴尬的背后却蕴藏着一种欢乐，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欢乐。

语言问题同样出现在安蒂公·克法拉的《亚历克西娅》和